

环保税来了,“绿色指挥棒”发力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郁琼源)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此取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4月1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确定?对哪些行业影响较大?针对各界关心的问题,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对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其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2元至12元,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元至14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份按低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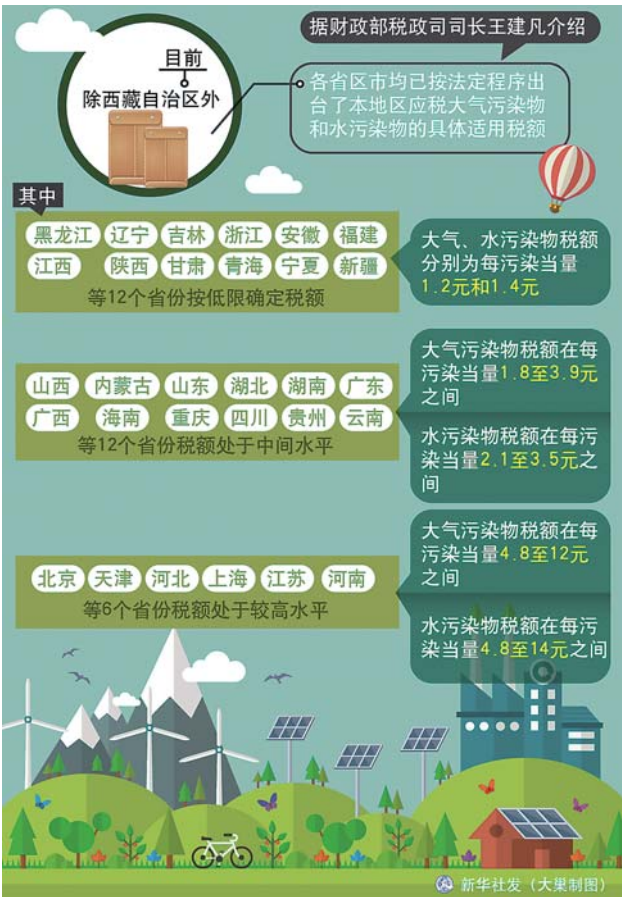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2个省份税额处于中间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1.8至3.9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2.1至3.5元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河南等6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4.8至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4.8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较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税额标准10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河北则按照最低税额标准8倍确定了环北京13个县的大气和水中共主要污染物的适用税额。

此外,江苏也在省内不同区域确定了差异化的税额,内蒙古、上海、重庆、云南4省市区税额采取分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台的税额统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



求,有利于发挥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财政意义。”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环保税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比很小,开征环保

税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构建绿色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账,助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标。”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一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但具有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缴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尘”的24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化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理,有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特别是高危害污染物的排放。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换难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门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保税征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监测专业技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部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是否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38年来,累计向1380万户排污单位收费共计3169亿元,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为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部历史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此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33万户,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原征收排污费减少了2/3的申报表及数据项,大幅减轻了纳税人申报负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确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税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展联合辅导和重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策、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缴纳期之前,各级财政、税务、环保等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准备工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序进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策,为纳税人提供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务,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提升污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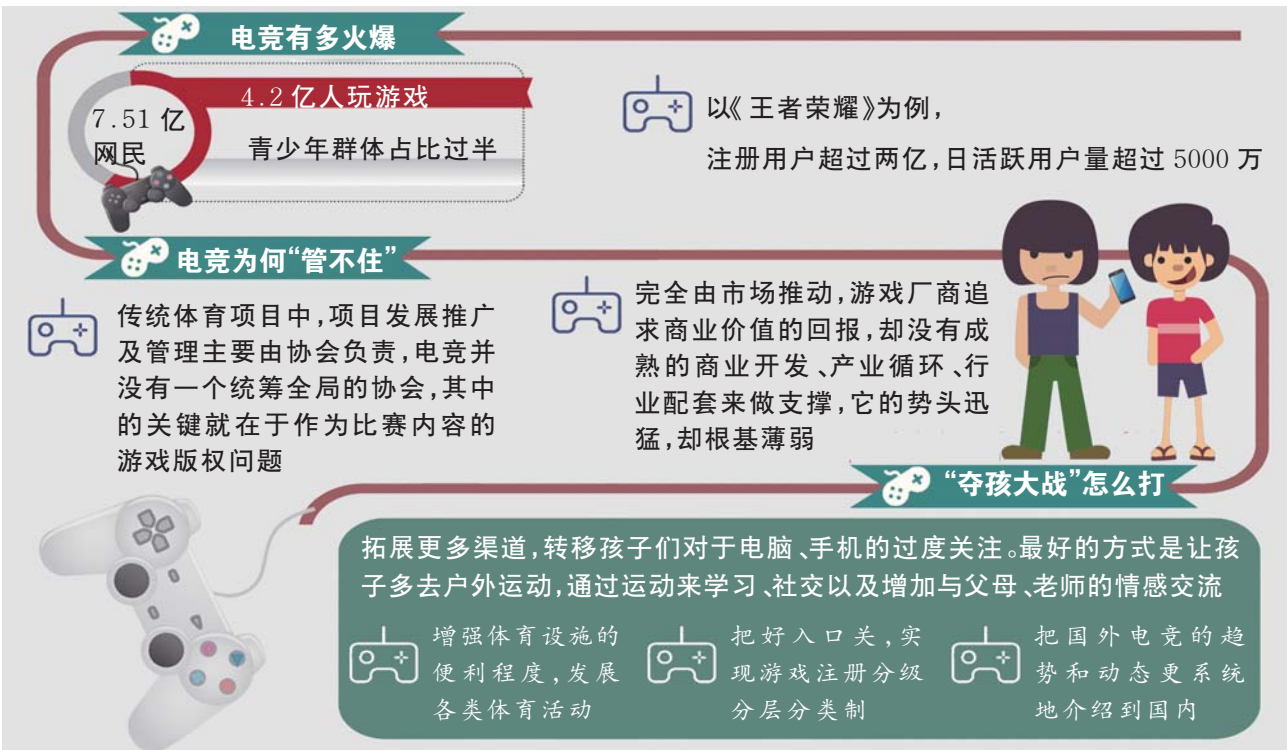
电竞:“没人疼的孩子”却跟我们抢孩子

电子竞技已在数亿青少年的电脑手机“扎根”,家长们正面临一场“夺孩大战”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林德韧、肖亚卓、朱翊)作为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张玲最近非常苦恼:儿子本应全力以赴备战高考,但她偶然间发现,孩子经常在半夜睡觉后躲在被窝里打一款电子竞技类游戏。

“说实话孩子有点上瘾,我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家长,但游戏对孩子真的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张玲颇为无奈地说。

电子竞技近年来成为青少年群体中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化现象,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7年的统计报告,仅中国的7.51亿网民中就有4.2亿人玩游戏,占比过半;从人群结构和游戏类型两个维度统计,青少年群体和电子竞技类游戏在其中的占比也均过半。



“没人疼”的电竞陷入“没人管”的狂欢

周女士是北京的一名“白领”,她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虽然课业很忙,但每天总会抽出大半个小时来打几局《王者荣耀》。“现在这个已经成为孩子们交流的一种方式了,你不玩,可能跟别人都没得聊。”周女士说。

前FIFA项目电子竞技职业选手杨子涛说:“如果一个孩子不打游戏,而你身边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王者荣耀,你是不是会觉得你被大家排除在外?电竞扮演了以前足球、篮球的角色。”

在体育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电竞因为其庞大的参与人群和出色的变现能力受到很多关注和期待。以《王者荣耀》为例,通过在各类渠道的迅速扩张,收获了超过两亿的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量超过5000万,为母公司带来巨量利润。

电子竞技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扎根”有着多样的原因。国家体育总局原信息中心主任丁东表示:“电子竞技受到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下的青少年的喜爱,80后、90后、00后,他们从小就接触到了互联网,而电子竞技正好契合这样的大环境。”

丁东认为,电子竞技因互联网而生,因互联网而兴,集泛娱乐、高科技、便捷化等特点于一身。

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支持,发展起来之后缺少监管,是电子竞技项目特有的状态。电子竞技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短。虽然早在2003年体育总局就已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体育项目,但在地方体育部门的工作中,电子竞技并不是重点;在传播渠道方面,它在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上的曝光度也是少得可怜。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电竞是“没人疼的孩子”。

也许正是因为“没人疼”的背景,让电子竞技在“没人管”的土地上“疯长”;当它真正发展起来时,人们才发现“主流”手段已经很难“管”住它了。

“管不住”的电竞在2017年继续一路狂飙,其势头已经引起了传统体育界的关注。4月,亚奥理事会宣布电子竞技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10月28日,国际奥委会(IOC)在其第六届峰会上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具有竞争性的电子竞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育运动,电子竞技选手为为之付出的准备活动、日常训练的强度等,都可以与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员相媲美。”此举被认为是国际奥委会对电子竞技项目的正式承认。

是体育?不是体育?——电子竞技的身份迷局

电子竞技的火爆已成为现实,但溯本清源,关于电子竞技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和归类的问题,各方依然秉持不同的观点。

王者荣耀官方赛事KPL联赛运营商VSPN公司创始人滕林季认为:“电竞是体育和娱乐产业结合的复合产业,娱乐属性比传统体育重得多,没必要非得说自己是体育。”

不过,在阿里体育电竞项目部负责人王冠看来,电竞就是运动的一种。“电竞是新事物,尽管它脱胎于电子游戏,娱乐属性更重,但本质上和传统体育是一样的。”王冠说。

电竞一方面受惠于因泛娱乐化而聚拢起来的庞大人群极

其带来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又有着与“游戏”隔离,以期获得“主流”承认的动机,在这样的身份迷局中,电竞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

要对电竞实现有效管理,难度很大。传统体育项目中,项目发展推广及管理主要由协会负责,电竞并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协会,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作为比赛内容的游戏版权问题。

上海电竞协会副秘书长陶俊赢说:“和传统体育相比,电子竞技完全由市场推动,游戏厂商追求商业价值的回报,却没有成熟的商业开发、产业循环、行业配套来做支撑,它的势头迅猛,却根基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竞技层面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挖掘无法匹配商业价值上的发展势头,所以社会公益效应的体现就极为欠缺。其实电子竞技有责任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占据了当下最庞大、最有活力的人群。”

目前,要想真正让电子竞技向传统体育项目那样进入协会模式的管理,脱离游戏厂商的主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夺孩大战”,胜算几何?

不管怎样,电子竞技都已在数亿青少年的电脑手机“扎根”。既要保证孩子正当的游戏娱乐权利,又不能让孩子过分沉迷,在传统的“封堵”与“打压”办法均收效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打赢这场“夺孩大战”是摆在家长们面前的一道非常严肃的考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易剑东认为,“一禁了之”和“无原则地鼓励发展”两种观点均不可取,他说:“过去是打压,现在有很多情况是鼓励和提倡,我的建议是不耍打压,通过积极引导、健康调控和有效研究,用这些方式告诉孩子真相,了解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

体育产业生态圈联合创始人萧深说:“如果我们批判一番、打压一番,孩子们都不玩电竞了,那也行;但现在看来这样反而会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学校跟孩子之间,学校跟家长之间,孩子跟体制之间,制造出很多矛盾来。”

易剑东表示,虽然目前关于电竞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电竞发展势头如此迅猛的情况下,应当由更高级别的机构更为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搞清楚电子竞技对青少年到底产生哪

些影响。只有全面了解情况,才有可能进一步制定对策。

2017年6月28日,一篇题为“怼天怼地怼王者荣耀”的网络文章迅速蹿红,文章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以个人观点阐述了《王者荣耀》对孩子精神空间的占据,其中一句话被大量转载:“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恨看到孩子们沉迷手机的样子:那种专注、那种迷恋、那种爱慕、那种笑逐颜开……那种表情是我们一直渴望从孩子身上得到的,也是他们一点点都不舍得给予我们的,更是孩子在成长之后渐渐消逝掉的。”孩子的沉迷、家长的无力,在文章中尽显无疑,也留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

滕林季说:“少年人对游戏的爱大于父母,也是因为父母和孩子的沟通出了问题,父母们不知道怎样跟年轻人沟通,所以我们呼吁爸妈们跟孩子一起玩,小孩可以看电竞比赛,但要家长陪同,家长和孩子建立共同的情感连接,聊共同的话题。”

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腾讯官方也推出诸如“实名制”“12岁以下每天限玩一小时”等措施,但这些防沉迷措施很快就被“破解”,预期效果打了许多折扣。

针对电子竞技“不规范”的问题,陶俊赢认为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角色,他说:“规范不完善,那么政府就要推动完善;管理有缺失,那么政府就要强化管理。”

在“封堵”这一招已经失灵的情况下,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应当拓展更多渠道,转移孩子们对于电脑、手机的过度关注,最好的方式是让孩子多去户外运动,通过运动来学习、社交以及增加与父母、老师的情感交流。

易剑东对此提出建议:“首先,要增强体育设施的便利程度,发展各类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到处遍布,体育活动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吸引,这也是电子竞技在欧美国家至今成为不了主流的原因。其次,把好入口关,实现游戏注册分级分层分类制,提高游戏注册整体的门槛。第三,把国外电竞的趋势和动态更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支持一些科学研究,比如电竞对人类的危害等等,用数据来给社会传导一些正面的东西,电竞在中国有这么大人群,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做一定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电竞不是魔鬼,但沉迷有害,跟电竞抢孩子,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河北省纪委近日通报了7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相关10余名领导干部被问责:河北省委责令张家口市委书记、市长向省委作出深刻检查,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受党内警告处分,市纪委原书记调离岗位,蔚县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和康保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已被免职,康保县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一连串案例和严肃问责的背后,透露出当前扶贫领域哪些主要矛盾和漏洞?

冒领、骗套、暗箱操作

张家口市康保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位于河北坝上地区,生态脆弱,农业靠天吃饭,基本没有其他产业,百姓生活艰难。然而,这个县扶贫中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全县15个乡镇均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私设“小金库”。

一些知情的干部群众说,康保县扶贫和涉农资金层层截留、雁过拔毛,能落到困难群众手里的少得可怜。扶贫干部蜻蜓点水式调研,表面上做做样子,但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漠不关心。事实上,康保县暴露的问题在张家口市并非个案。2017年9月、10月,调查发现张家口市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41件,违规违纪问题突出。

记者梳理张家口市纪委网站2017年公布的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发现贪腐手段五花八门,老问题屡禁不止,主要涉及扶贫资金、产业扶贫项目和危房改造。

——骗取贪污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张北县小二台镇化稍营村支书在为该村申报奶牛养殖项目过程中,用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原有住场奶户的奶牛顶替扶贫项目牛,骗取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5.2万元。

——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赤城龙关镇窑湾村支书用该村60.5亩集体土地套取国家粮食直补资金共计41140.95亩集体土地套取国家粮食直补资金共计11902.77元,全部用于村两委日常开支。

——冒领挪用扶贫发展资金。尚义大青沟镇前官地村支书和村会计冒用该村30户村民的名字从该镇财政所领取扶贫发展资金15万元,将其中的9.98万余元用于偿还村集体债务,剩余5.01万余元5名村干部平分,据为己有。

——截留惠农资金。康保县闫油坊乡南乔家村支书私自截留国家下拨的退耕还林、良种补贴、粮食直补、草原生态奖补等惠农资金共计48万余元,用于村集体日常开支。

——违规分配。万全区安家堡乡田茂庄村实施扶贫项目肉鸡养殖,该村党支部违规分配使用应付于贫困户的入股分红款,其中,6.62万元平均分配给全村村民,1.37万元用于村集体日常开支。

——违规乱收费。怀来县桑园镇东蒋营村支书、村委委员在为该村低保对象办理低保时,违规向42名办理低保人员每人收取700元。村干部不按规定办低保、违规收取好处费、死人继续拿低保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频现。

——危房改造暗箱操作。涿鹿县保岱镇辛庄村村委会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确定危房改造户名单,并违规向被摸底户、危房改造户村民收取费用共16980元,全部用于村委会日常开支。

两年间378件问题线索只查结66件

河北省纪委对张家口市及蔚县、康保县的查处,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一些群众说:“上级部门这次查处动真格,让我们看到了真扶贫、扶真贫的决心。”

提到张家口,贫困是重要的关键词,全市10余个县中只有一个非贫困县,是河北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和筹办北京冬奥会,都给张家口脱贫攻坚和未来发展带来了曙光。然而,有当地知情干部透露,张家口对脱贫攻坚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扶贫项目实施、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缺乏检查和监督,连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在定点联系扶贫村期间,都没有及时发现相关资金问题。

有基层干部坦言,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扶贫工作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盛行。蔚县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双组长”,长达一年没有召开领导小组会议。2014年至2016年,对上级纪委交办的378件问题线索,蔚县只查结66件。不及时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不仅是蔚县。据康保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15年和2016年,河北省对康保县开展巡视和巡视整改回头看,康保县不但没有落实有关反馈意见,更没有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扶贫工作很多都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上面指得多,具体落实少。”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吐槽:“我们表格填得多、材料写得多,领导们宣传政绩多,解决实际问题少。”

监督监管层层失守,机制短板亟待弥补

张家口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还暴露出相关监督、监管层层失守。市纪委、政府、纪委履职缺位,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都没有及时关注相关问题,市扶贫办、住建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对日常监管不够重视。另据了解,本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责任的纪委长期压案不办,甚至接受被审查人财物和宴请,在案件审核中避重就轻。一些基层干部说,张家口一些县财政收入少,而且县里有大量的非财政供养人员和非财政开支事项,于是就打起扶贫资金的歪主意。除了贪污挪用,由于很多扶贫项目都需要地方配套,地方配不起,导致大量扶贫资金滞留。

目前,河北省已责令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限期全面整改,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查失职渎职行为,严惩违法违纪分子。对胆敢向扶贫项目、资金伸手摸、“动奶酪”的腐败问题以及弄虚作假、数字脱贫等不严不实问题,严查快办、严惩不贷。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唤醒责任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狠抓落实的良好政治生态。此外,有专家建议,要研究扶贫项目资金分配政策,采取更为合理的办法,避免因政策不完善而造成资金滞留和浪费。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1日电